

ZHUNDUIHUA

NIKUANGHUAN

准对话 · 拟狂欢

——1980年代探索戏剧研究

林 婷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ZHUNDUIHUA

NIKUANGHUAN

准对话 · 拟狂欢

——1980年代探索戏剧研究

林 婷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准对话 拟狂欢:1980年代探索戏剧研究 / 林婷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6

ISBN 987-7-104-02771-3

I. 准... II. 林... III. 戏剧-研究-中国-当代
IV. J809.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5589号

准对话·拟狂欢

——1980年代探索戏剧研究

责任编辑:方育德

美术编辑:王恬

版式设计:郑浩

责任校对:刘学青 赵莹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话:010-58930221 5892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真: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640 mm × 960 mm 1/16

印张:15.125

字数:232千

版次:2008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87-7-104-02771-3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一

探索戏剧探索什么？

董 健

在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林婷以沉静、多思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平素腴腆而寡言，看起来冷冷的，但这不过是她的外表，其实她内心里总是在翻腾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至少在她所研究的领域里是这样。在我给博士生上课时，每到讨论开始，她并不抢着发言，然而一旦给她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她就会热情地、滔滔不绝地说出她之所思，并提出一个个视角独特的问题，目光中透出一缕强烈期待着“质疑”、期待着“对话”的精神。仅仅就此而言，我也觉得林婷博士论文的选题《1980年代探索戏剧研究》对她是很合适的。不多一点思考、探索的劲头儿，怎么能研究好“探索戏剧”呢？

转眼间林婷博士生毕业已经三年，她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学术专著《准对话·拟狂欢——1980年代探索戏剧研究》即将出版。我愿在这里写上几句话，既是表达我的祝贺之情，也是借以说出我对探索戏剧的一点看法，向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请教。

我认为，在1949年至2000年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戏剧史上，1980年代的探索戏剧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说它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不为过。尽管它本身（恰如林婷在书中所说）尚存在不少问题，也未能产生出什么深邃的理论和伟大的作品，但它第一次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叛逆”思潮，对“十七年”和“文革”长期统治文学和戏剧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及其所支持的陈旧的戏剧模式，进行了批判和否定。这种批判和否定在1950年代、1960年代也曾出现过，但微弱而短暂，迅即被主流意识形态镇压下去了。而1980年代这一次，却乘改革开放之势，成了“气候”，成了“思潮”，虽



遇反改革僵化势力的阻挠、破坏,终于能破冰前进,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戏剧发展的趋势,使得戏剧的思想空间和艺术空间都得到了空前的扩大,使得戏剧初步回到了“五四”开启的现代启蒙主义的“人的戏剧”的正道上来。正是在这一大趋势之下,老一辈戏剧家如曹禺、夏衍、陈白尘、吴祖光、黄佐临等,热情支持年轻一代的大胆探索,终于看到了他们多年所力求而难得的一个现实:把戏剧从褊狭的政治实用主义下解放出来,扭转戏剧左倾、虚假的非人之路。也正是在这一大趋势之下,出现了以高行健、林兆华、徐晓钟等为代表的一批戏剧探索者,产生了话剧《绝对信号》、《车站》、《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以及京剧《曹操与杨修》等一批优秀剧目。就其批判现实、表现人性、探索人类“对话”精神的力度和深度来说,这些作品不仅代表了1980年代探索戏剧的水平,也在思想和艺术上完全超越了“十七年”和“文革”的戏剧。这是五十年当代戏剧史上的一个高峰。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转形期文化的虚假和平庸以及戏剧精神的严重萎缩,我仍然十分留恋那个充满探索精神的“1980年代”!

林婷对1980年代探索戏剧的研究,我觉得是相当到位的,可谓深得其旨。她运用了巴赫金关于“对话”、“复调”、“狂欢”的理论来分析探索戏剧的本质和特征,虽然有时叫人觉得还有些拘泥,但总体看来,由于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她就多少能超越巴氏,而不使既成的理论框架限制了自己对戏剧艺术的分析,因为巴氏研究对象的重点并不在戏剧上。在我看来,“对话”也罢,“复调”也罢,“狂欢”也罢,都是讲一种张扬平等、自由,冲决既成“秩序”的精神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曾有过类似思想的萌芽。譬如中国古代就有学者认为,“乐”这种艺术(它不单指音乐,还包括舞蹈和诗歌)能使不同等级、地位的人暂时超越“贵贱”之别,进入“论伦无患”、“欣喜欢爱”的“上下和”的类狂欢状态(见《礼记·乐记》)。巴赫金的理论则更加全面、系统,充满理性、面向现代,他的伟大即在此。近十年来我曾反复强调(不论在课堂上还是在文章中),人在精神领域的“对话”是定位在“人学”的现代戏剧的首要特征。舞台与观众的关系再也不是那种单向的,由前者向后者“灌输”些什么的“教化”关系(即林婷博士在书中所批评的那种“独白”的戏剧),而是双向平等交流、精神“对话”的戏剧审美关系。我曾不避僭越之嫌地创造过一



个概念：“中国式的易卜生主义”，用以说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其要义就是平等“对话”的自由精神，其他诸如揭穿人与社会的“瞒”与“骗”，追求高度的“真实性”、“批判性”等等，均由此来。探索戏剧探索什么？首先就是要探索这条通向自由的精神之路。在这里，精神探索第一，物质手段第二。然而我们的戏剧探索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是有摇摆的。有时是出于无奈，迫于政治压力；有时则是出于认识上的误区。当时的理论支持者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如林克欢对高行健剧作之“多声部”、“复调”的研究，便主要用力在外部形态和物质手段的分析上。高作在精神探索上本就微弱，理论分析者非但未能指摘这一缺点，反而以外部形态与物质手段的头头是道的阐释掩盖了它。这对戏剧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林婷说1980年代探索戏剧的“对话”是“准对话”，称其“狂欢”为“拟狂欢”，显然，她的措辞是深含着对这场戏剧运动和戏剧思潮的批判之意的。此一点深得吾心。我甚至觉得，她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探索戏剧存在问题的批判，在力度上是超过对其成就的分析的。对学术研究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从对“十七年”和“文革”戏剧的批判和否定之功来说，或者从对1990年代以来戏剧之虚假、平庸之风的比照来说，1980年代戏剧的探索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留恋，值得我们赞扬，但它存在的问题却是不能回避的。最要命的是，探索者们仍然继承着那种“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单线思维模式。在1980年代的“戏剧观”大讨论中，一方面是思想解放的锐气，一方面又伴随着新的褊狭、新的片面性。在批判戏剧“政治化”的同时，又兴起了贬损“思想”和“精神”的所谓“去政治化”。他们一味地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批“第四堵墙”、批“舞台幻觉”、批“现实主义”，一味地捧布莱希特、捧观演“直接交流”、捧“间离效果”、捧“现代主义”，在这一“批”一“捧”之间，恰恰忽视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戏剧的“人学”定位问题，即舞台上如何深挖人性之“真”、表现人的精神状态的问题，而把探索之力用在了那些本来就是两可的技术性、物质性的外部形态的问题上。1980年代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批“异化”论，实际上是否定了“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及其对文学艺术的根本意义和价值，这给当时的探索戏剧以很坏的影响。20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无须再加辩论了。目前戏剧上的技术膨胀、精神萎缩之风，除了商品经



济下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之外，不能说与 1980 年代的遗留问题无关。就此而言，林婷的这部学术著作也不失其现实的意义。

2006 年 4 月 25 日于跬步斋



序二

庄浩然

林婷博士的研究专著《准对话·拟狂欢——1980年代探索戏剧研究》即将付梓,我有幸成为它的最初读者是十分欣慰的。面对这部散溢着浓重的学术气息的书稿,她嘱为作序,我一时却不免踌躇;因我既不是研治探索戏剧的行家,亦非学识渊博、自成一家之言的书评家。然作为她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却又不容辞,便慨然允诺。

关于上世纪80年代探索戏剧的研究,堪称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上最富活力、艺术实践与理论建树蔚为共生互制景观的断期研究。其介入的学者之多,涉及的面之广,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与历史纵深度,也为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其他时期的理论批评所难以比肩。尽管迄今尚无关于探索戏剧的专著问世,然已有的创作谈、剧评、论文,戏剧史或戏剧论著的专章专节,可谓数以百计。其内容虽深浅不一,见解歧异,但它为探索戏剧的全面深入的研治,既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原始资源,也奠定了相当厚实的基础。特别是著名当代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先生,秉持对现代戏剧文化思潮的敏锐感悟与睿智胆识,启用建立在人学始基上的戏剧本体论等理论观点,以中外戏剧发展的艺术经验与教训为参照,对探索戏剧的理论营造与探索实践的深入考察与探究,所作的客观评估与总结,允称将探索戏剧的学理研究上擢到自己时代的高度。其数以十计的论文、剧评及戏剧史的专章,至今仍葆有理论指导意义与历史生命力。

诚如美国当代理论家迈克尔·莱恩所言,“每一种理论流派似乎都偏爱某些类型的文本”,然同一种文本却可运用诸多理论视角予以多面的解读^①。戏剧艺术现象的阐释亦不例外。不同的理论视角或批评立

① [美]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19页。



场,既可彰显同一戏剧现象阐释的开放性,又可检验当代文论在批评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藉以达成戏剧现象的复杂性与理论流派的生命力的双重展示。在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蔚为历史大潮的当下,林婷博士的专著,于审察、反思已有研究的观念建构、不同范式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启动巴赫金诗学的理论与整体性方法,重新检阅、梳理、阐发探索戏剧的编剧、舞台艺术及观演关系。这种不同的理论视角,一方面有利于探索戏剧研究容纳理论的“复数”形态,获取多方位的参照,形成研究场域的“多声部”奏鸣,从而推进、深化探索戏剧的历史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不同的观念学说与学术思想,于探索戏剧生态场中展开“对话”,藉以丰富当代戏剧研究的术语库藏与方法论,亦可验明巴赫金诗学的个性特点、优长与限度。显然,这是富有开拓性与学理价值的研究课题,也是这部专著的最大特色之所在。

林婷博士笃学敏思,锐于进取与开拓,是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得力人选。硕士生阶段,她在倪宗武教授的精心指导下研治当代戏剧,确立了以身相许戏剧的毕生宏愿。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师从著名现代戏剧史家董健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戏剧学发祥地之一——南京大学浓郁的学术氛围中,不独开阔了中外戏剧文化视野,也极大地提高了理论思维与语言表述能力。她的学位论文《戏剧形式与对话精神——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探索剧为例》,创造性地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多维度、多层面地检视、考究探索戏剧的形式革新及其所蕴含的“对话”的精神诉求,同时审度其开拓性的历史贡献、成就及缺陷,论文的部分章节曾在《戏剧艺术》等刊物发表。它不仅为本课题奠定了主体基架,也打下观念与资源的坚实基础。鉴于她的博士后研究拟对博士论文予以扩展、充实,我建议她启用巴赫金诗学的核心范畴或关键词,从“对话”延伸到“复调”、“狂欢化”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同时借鉴巴赫金的整体性研究方法,对探索戏剧多方位的艺术追求、精神特质及内存的诸多问题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藉以达成对探索戏剧的另一理论视角或批评立场的阐释。林婷一面强化文本细读,全力搜集与观赏有关的音像资料,并进一步了解已有研究动态,同时深入把握巴赫金诗学的理论观点,广泛接触中外戏剧的理论与历史论著,涉猎相关的西方近现代美学、文论。在此过程中,她对探索戏剧的形式、意蕴及其赖以生成的文化语境、历史渊源等,均有不少新的感



悟与发现,其对探索戏剧的认知、评鹭也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这部论著不独表征了她那执著坚韧的学术追求与探索精神,也成为跨学科的戏剧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硕果。

以探索戏剧为研究的生态场,策动巴赫金诗学与戏剧美学的有关理论相互搭接、相互生成,藉以丰富探索戏剧研究的理论镜象与范畴术语,是这部专著的显著特点。巴赫金诗学的核心关键词“对话”、“复调”、“狂欢化”等,由大文化和小说诗学的语词进入探索戏剧的研究场域,既要保持自身的基本内涵与理论特质,又要接受戏剧学本体特征的检察与规约。这对于巴赫金诗学的张力与适应性来说,是一种“越界”的测试与验证,同时也为探索戏剧创设了另一比较、分析的平台;而对于当代戏剧学的建设来说,则可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与丰富的个案范式。如何使两种内存扞格的学术思想与观念学说,于探索戏剧的复杂生态场中,彼此碰撞而又相互沟通,从而达到互补双赢的学术效应,无疑是摆在林婷面前的一道难关。在这方面,她付出了艰巨的创造性劳动,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收获。诚如她说:

“对话”、“复调”、“狂欢化”的诗学体系是建立在小说研究基础之上的,当它被借用到探索戏剧的研究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使既有的理论构架适应于新的研究对象。著者在吃透“对话”、“复调”、“狂欢化”的精神内核之后,根据戏剧艺术体式自身的特点以及1980年代探索戏剧的实际情态,提炼、阐释其对话、复调、狂欢化的精神诉求及表现形态。由于探索戏剧不论精神特质还是形式表征与巴赫金所论的“对话”、“复调”、“狂欢化”等并不完全相似,也由于戏剧与小说不同的艺术规定性及探索戏剧自身的不成熟,更由于中国1980年代精神外环境的复杂,导致了探索戏剧中种种“准对话”、“类复调”、“拟狂欢”现象。或形式的效果未能完全实现其精神诉求,或对话性、复调性追求与戏剧固有属性存在牴牾,或精神对话与感官狂欢产生扞格……这一切都使探索戏剧无法单纯在“对话”、“复调”、“狂欢化”的理论视域下获得穷尽本相的阐释。

鉴此,作者没有让巴赫金诗学理论完全笼罩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是坚持以“戏剧自身的特性”为审度的另一“基点与标杆”,精心建构了既使两种理论相遇合,又能因应研究对象的逻辑框架,力求达到理论

学说的生命力与戏剧现象复杂性的双重展示。

全书以四个专章为支架,将编剧、舞台表演、剧场与观演关系融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前两章以“对话”、“复调”的理论视角检视探索戏剧的编剧艺术。在这里,某些原先不被人注意的特征获得了呈示与阐释,如内心对话的多种形式,戏剧语言的双声性质,戏剧动作的脱冕加冕等。而某些已被总结的形式特点亦获得新的诠释,如冲突淡化,开放式结构,群像式人物,叙述者所内含的“对话”、“复调”诉求。与此同时,著者揭櫫了探索戏剧因“对话性”的增强而不同程度地导致动作、冲突等戏剧性要素的弱化或消解,其“复调性”、“多声部”的追求亦内藏着多元性淹没价值性的症结或隐患。后两章则以“狂欢化”的理论视角审察探索戏剧的舞台艺术与观演关系。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对舞台表现与观演关系的种种形态描述已经详尽备至,但这些形式变革所内蕴的精神诉求与现实问题并未得到系统、深入的探究。著者发现形式变革所蕴含的对社会转型期大众文化需求的感应,张扬创作艺术个性的欲求,及融合、亲昵、游戏、民主等种种剧场旨趣,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狂欢化”的精神诉求。然这一“狂欢化”的精神诉求,却偏重于世俗、感官、形式化的追求,而弱化了其融合、沟通、解构、反叛的精神效能,其结果遂导致物质性剧场狂欢对精神性对话空间的挤占。这与巴赫金所界定的崇尚自由、反抗专制、诙谐乐观的“狂欢化”精神内质并不一致。而对后现代戏剧“狂欢化”形式的仿效,也存在着脱离1980年代现实及观众文化基础与需求的倾向,由此著者进一步探讨了它与1980年代戏剧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使舞台艺术与观演关系获得了新的理论视角的检视与言说,也避免对“狂欢化”理论的机械移植。尽管著者沟通两种理论的观点建构、运作机制、表述方式及得出的某些结论,未必能够获得读者的一致体认,甚或还会引出不同意见或各种质疑,但她毕竟在理论视角或批评立场上跳出了探索戏剧已有研究的范式、机制与思维定势,其前瞻的、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学术视界,显示了一位现代戏剧学者应有的创新与包容精神。尤为可贵的,她于“开放”中“恪守”戏剧性规范的学术立场,在两种理论“对话”中寻求“沟通”的价值取向,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从探索戏剧自身的复杂性出发,采取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坚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专著写作的另一显著特点。著者力图将



研究对象置于共时性的社会文化、戏剧文化语境与历时性的中西戏剧史论传承的坐标系中,藉以取得宏观的纵横交错的立体的审度视角。论述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形式研究与主体研究、形式诗学与历史诗学的有机结合,期求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的把握。然引人瞩目的是,著者对着力探究的诸多问题并不轻易做出推断与结论,而倾重于采取症候式的展示与剖析,这从书名与章节标题的设定即可窥见。这种求实的慎重的学术态度,不单是尊重客观事实与读者主体接受的一种表征,也使探索戏剧自身的复杂性得以彰显,诸如编剧、舞台艺术及观演关系的锐意创新与失误、偏差,形式与意旨、目的与效果的悖逆,理论的多维取向与内存的错位、逆反,等等。其阐释不时闪露出理性思维的熠熠光彩,也蕴含着种种新的发现与见解。

作为国内第一部探索戏剧研究的专著,又是率先运用巴赫金诗学对探索戏剧进行整体研究,该书难免存在一些弱点。著者对探索戏剧的反思与审度,显然更多着眼于外在形式的探索及其蕴含的多方面的精神诉求,而疏略了“内在意义的探索”的考量与探究,这就使著者未能始终站在“戏剧是人学”这一制高点上检视、审度探索戏剧,并将巴赫金诗学与戏剧美学的相互搭接与沟通始终奠立在“人学”这一更为坚固宏厚的基座上。正如谭霈生所指出,探索戏剧的革新运动朝向两条不同、“各有侧重”的线路:一条是“偏重于形式革新”,一条是“以人的本体观为中心”的“内在意义的探索”^①。前者是“一个比较容易突破的部位”,它被作为戏剧危机时探索的“突破口”,系“出于一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植根于人们“求新思变”的普遍的社会心理,而不是“出于戏剧‘内在意义’变革的需求”。因而,在形式革新促成短暂的繁荣之后,戏剧重又陷入危机。事实彰明,“外在形式的革新是必要的,但这种革新必须依附于内在意义的变革,否则它就不会有生命力”。与形式革新相并立的,是“戏剧对人自身的探索”。后者是“在一个重要的方位上探索”,由于“人学这个坚固的部位”是“最难突破的关口”,所以“收效并不十分明显,常常被人忽视”。谭霈生认为1986年后,这两条线路开始出现“合流”,《狗儿爷涅槃》、《黑色的石头》、《桑树坪纪事》、《荒原与人》等几出戏,都是在人的本体这一方位上进行探索的剧目,但实

① 谭霈生:《新时期戏剧艺术论·导论》,《谭霈生文集》第5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447-448页。



际上,它们也体现了“形式革新与内在意义探索的分股合流”,标志着探索戏剧已然达到较高的水准。鉴此,他澄明只有“把戏剧内在意义的探索,与外在形式的探索,融合为一”,方能“求取中国戏剧多线路、多风格、多形态的并存与竞争”^①。谭霈生 1989 年对探索戏剧在曲折中前进的这一描述与概括,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彰显了他的“人本体”的戏剧文化观。

这部专著的丰富内涵和优长及弱点,是此篇小序难于概括的。短短两年,林婷博士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不论酷暑、严冬,孜孜矻矻,笔耕不辍,向学界奉献出一部富有创见、量丰质优的学术佳作,中国探索戏剧研究终于有了它的第一部专著,而且著者是一位年轻的女博士,这本身就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但这只是林婷学术生涯的一个耀眼的起点,以此为契机,她将会为现代戏剧学术界奉献出一部部精品。

2007 年 3 月 30 日于福州

① 谭霈生:《中国戏剧的现状、问题和走向》,《谭霈生文集》第 5 卷,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年第 164-179 页。



目 录

序一 探索戏剧探索什么?	董 健
序二	庄浩然

导 言	1
-----	---

第一章 对话:诉求与失衡	11
一 对话:美学与历史的检视	11
二 自我对话:来源与转化	18
三 自他对话:解构与重建	27
四 潜对话:语言的微观考察	36
五 对话性与戏剧性的失衡	48

第二章 复调戏剧的探索	68
一 从巴赫金的论断说起	68
二 结构:复调视角的寻求	74
三 多元性与价值性的掣肘	83
四 脱冕与加冕:动作的寓意	94

五	叙述者:复调还是宣教	99
第三章	舞台:符号的狂欢与艺术的难题	105
一	动作:从语言到形体的文化理路	105
二	焦虑与救解:探索方向的确立	117
三	视听的狂欢:舞台符号的革新	123
四	传统如何生成现代	135
五	“表现”的冲动与接受的难题	147
第四章	观演关系:狂欢式的摹仿与背反	161
一	距离与交流:观演关系三形态的重新考察	162
二	剧场:空间的暗示	170
三	表演:姿态的隐喻	176
四	观众:身份的转变	183
五	狂欢式的摹仿与背反	188
结 语		203
附录一 / 主要参考文献		210
附录二 / 探索戏剧部分作品目录		215
附录三 / 对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理论的再认识		217
后 记		229





导 言

我们将探索戏剧界定为:贯通于 1980 年代以形式革新为主,结合精神探索的一批话剧。虽然在戏曲领域也出现了探索性的作品,如川剧《潘金莲》、桂剧《泥马汨》等,但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内。之所以用“探索戏剧”之名而非“探索话剧”,在于这类戏剧与传统话剧在形态上判若两样,“话”已经无法包容它们全部的属性。1980 年代探索戏剧尽管大多数作品不具备经典的成熟性,却以其锐猛的革新精神、声势浩大的波及面,对 1980 年代戏剧界乃至整个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当时确立的探索方向及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延伸、交融进当下的戏剧实践中,且其存在的问题在今天的戏剧发展中也仍然延续着。就此而言,这一研究课题的选择有其现实的意义。

一 研究现状的评述

目前关于探索戏剧的研究,或理论辨析、形态描述,或问题探讨、戏剧史定位,基本上涉及到对四个关系命题的阐述:一、探索戏剧与 20 世纪西方现代戏剧思潮;二、探索戏剧与中国传统戏曲、民间艺术形式;三、探索戏剧与 20 世纪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史;四、探索戏剧与 1980 年代社会的文化生态。

在第一个关系命题上,研究者一致认为:1980 年代探索戏剧的发生、发展与西方 20 世纪戏剧思潮的东渐有着密切的关系。举凡 20 世纪出现过的戏剧流派,诸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布莱希特的叙事体史诗剧,及构想于阿尔托,成形于彼得·布鲁克、格罗托夫斯基、理查德·谢克纳等的后现代剧场艺术实践,无一不在探索戏剧的理论与实践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而对这种影响的迹象、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在戏剧史料梳理、戏剧专题研究、作家作品评述的相关论文或著





作中均有涉及。

在第二个关系命题上,已经达成共识的是:1980年代探索戏剧有意识地借鉴中国传统戏曲、民间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以丰富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传统戏曲中时空的自由,表演的虚拟性,肢体语言的丰富,观演交流的积极等,都对探索戏剧编导思路的转变深有启发。这一方面现有的研究文章不少,而某些专著虽不是针对探索戏剧与传统戏曲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但亦包含了对二者关系的梳理与阐述。

在第三个关系命题上,虽未有专题性论述,但研究者将探索戏剧纳入20世纪戏剧发展史中加以审度,认为探索戏剧突破了十七年——“文革”戏剧的二元对立、扬此抑彼的封闭格局,赓续“五四”以来开放多元、广采博取的戏剧传统。亦有研究者认为,探索戏剧虽然努力突破1950、1960年代戏剧的写作规范,却仍隐性承袭着某种僵化的思维模式,显示出历史因袭的沉重。

至于第四个关系命题,在1980年代探索戏剧的同期评介、当代戏剧史的书写、博士论文的写作或某些专题性研究中,针对1980年代探索戏剧的文本内涵、形式特征、思潮现象、理论问题等诸方面的阐释,也都不同程度地论及。诸如:1980年代多元分化的社会生活促使探索者采用更为开放的戏剧结构、更为多元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丰富、广阔的生活内容;1980年代文化环境的宽松形成探索戏剧的多元化发展生态,而社会经济条件的好转与文化选择的自主又导致戏剧危机的产生,这一切都决定着戏剧探索的总体取向,等等。

这四个关系命题的既有研究成果,为我们把握探索戏剧发生的环境、原因及呈现出的艺术形态提供了宝贵的积累,但其局限性亦不必讳言。前两个关系命题的研究模式通常是将1980年代探索戏剧与西方现代戏剧及中国古典戏曲、民间艺术形式进行比照,或引征创作者的理论自述,说明“影响”的存在,或阐述形态的相似,证实“移植”的可能。其中也有少数研究者能够从“接受”的主体性这一角度对探索戏剧接受西潮的深层原因及接受中存在的误读现象进行探究^①,但大多数研究者仅将这种影响看成是自在生成,既未能深入体察1980年代文化生态、戏剧自身的精神诉求与探索戏剧理论、实践形态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未能从话剧的历史负载与现实处境等多种角度审度探索



^① 如周宪的博士论文《布莱希特与中国当代戏剧》。